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劫后反思】	“文革”印象：清华附中甘铁生访谈录	甘铁生·马 萧
【风雨人生】	一个老外的红卫兵经历	米鹤都
【史实考订】	关于《毛泽东最后十年》的一点看法	唐少杰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劫后反思】

“文革”印象：清华附中甘铁生访谈录

• 甘铁生·马 萧 •

受访人：甘铁生，采访和整理：马萧

受访人简介：甘铁生：出生于1946年，北京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革”时期就读于清华附中。

受访时间：2015年3月16日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的家庭背景。

甘铁生（以下简称“甘”）：我的父亲是台湾人，他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后来在军阀齐燮元的部队里担任日文翻译官。中日战争期间，齐燮元的部队投靠了亲日的汪精卫南京政府，父亲因为在齐的部队里工作，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汉奸”。而我的母亲出生在老北平，毕业于当时的燕京大学音乐系。

1947年，已被民国政府收编的父亲，深感留在大陆已无前途可言，于是借口回台湾探望年迈的祖父祖母，只身返台。临行前，父亲说将来接我们全家迁往台湾，但后来由于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两岸从此隔绝。父亲和我们从此便音讯全无。父亲回台湾前，已经养育了我们姐弟三人。

谈到我的家庭背景，我想不能不谈及到我的外祖父，外祖父叫甘云鹏，清朝的末代进士，1906年被清廷派往日本，入读日本早稻田大学，主修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制以及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历史。1908年回国，曾经在清朝政府担任度支部（财政部）主事等职务，还被北京优级师范学堂聘请，讲授经学。民国初年，外祖父又先后担任吉林国税厅厅长，山西烟酒公卖局局长兼山西清理官产处处长等职。1917年，外祖父因对当时的政局颇感失望，告老还家，隐居在北京的私人寓所“息园”，在此闭门读书著述，“息园”的藏书量达20万册。1918年，外祖父再次被选入国会众议院，1921年以后，外祖父彻底离开政坛，此后一直闭门专事撰著考据工作，直至1941年去世。1949年以后，

由于外祖父曾经从事过“封建官僚”一类的工作，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被归列为残渣余孽的范畴，而我的外祖母等一干亲人自然就属于“封建遗老遗少”一类的人物了。

现在讨论最多的是1949年建政后对城市资本家和农村地主阶层的消灭，其实还有一个大的社会阶层被忽略了，这就是传统的士绅阶层，就是像我外祖父这一类人。外祖父属于那种传统的知识份子，注重修身、养性，一生钟爱读书、藏书、著书立说，家风、门风极严，对家人和子女的要求非常高。记得我小时候，还看见我们家桌上总是摆放着一本《甘氏家训》，这还是外公的父亲甘树椿留下来的家族遗训，以此训诫他的后人们。而这一传统的士绅阶层在1949年以后被当作“封建残余势力”一并被铲除了，实际上，这一士绅文化传统承袭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典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内涵，并且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群体，但现在的知识界并没有对这一社会阶层的消亡引起足够的思考。

因此，无论是从我父亲那里，还是我母亲那里，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我的家庭出身都是不光彩的，父亲属于“反动军官”，而母亲则是“封建遗少”的典型人物。1949年以后，共产党在核查家庭成份时，母亲在她的家庭背景一栏内写了个“离异”，相当于和父亲划清了界限。后来，母亲的成份被定为“职员”，意思是生活在城市、有文化的小知识份子，结合母亲的实际家庭情况，用党的话说，相当于她的家庭历史有问题，但没有历史罪恶和犯下血债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

马：您认为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能被发动起来，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甘：1966年，“文革”发动时，我就读于清华附中高三632班，我想从学生和学校教育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认为，“文革”之所以能够首先在青年学生中被煽动起来，与1949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间长期一贯的“政治洗脑”的教育制度是密不可分的。自1949年以来，学校始终贯穿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主线，始终向学生灌输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忠诚，完全摒弃了自“五四”运动以来被中国知识界所推崇的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的现代教育理念。

就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初期，我们学校的校长万邦儒就被打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现在看来，实在是一桩“冤案”。在我看来，万邦儒校长在教学实践和个人的政治倾向上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左”的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在政治上始终是忠诚于共产党的，他也一直在学校的教学上贯彻党的阶级教育路线。我记得刚刚进入清华附中时，万邦儒校长便在清华大礼堂迎接新生的全校师生大会上，专门谈到基层党组织就是党在基层的化身，谈到“反右”运动的经验教训，他强调基层的共产党组织是不能反对的；他谈到学生的“家庭出身”、要求学生“又红又专”等问题时，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的是比我们高两届的一位高中毕业生，叫张明。记得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聪明的学生，上课总是玩，考试起来却总是得最高分，高考又得了高分，但却没有被录取，各个大学都不接收他，为什么？因为他父亲是国民党“反动”军官，跑到台湾去了，把他放在他叔叔——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寄养。你们想想，一个“反动”家庭出身的人，想上“无产阶级”的大学，怎么可能？因为他走的是“白专”的道路，所以学习成绩再好也没有用。他不懂这个，竟然还跑到高教部去闹事（甘：实际上是去讨说法），结果被扣在那里。然后高教部通知我们学校去把他接回来，接回来又扣在学校里，最后被警察当作“反动”学生抓走。

1962年，张明被遣送到新疆石河子劳改农场，1978年才获得“平反”，被劳改了16年！回到北京之后，他被留在清华附中任教，并且也成为了一名作家。当时，因为自

己的家庭出身“不好”，因此我对万邦儒校长的这番话记忆尤其深刻。一直以来，万邦儒校长对学生的教育实行的是严格的所谓“阶级路线”教育，教导学生“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要求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要“自觉革命，认识家庭，进而背叛家庭”，要以“革命接班人”的所谓“五条标准”去改造自己。

如果从一个大的时间跨度来看，从1949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整个六亿中国人其实都生活在这种意识形态熏陶之下，这十七年间，各种政治运动，从所谓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到1957年“反右”，到1958年的“三面红旗”，再到所谓的“四清”运动，中国社会已经被这些严酷的政治运动整得诚惶诚恐，服服帖帖。因此，党的权威已经再没有人敢去质疑，更谈不上公开反对，在青少年学生中尤其是如此，通过日复一日的“洗脑教育”，对党的忠诚以及共产主义信仰在我们内心之中早已扎下了根。

记得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同班级的一些小朋友在北海公园玩“捉迷藏”的游戏，突然发现一位中年男子，那形像跟电影中塑造的国民党“特务”很像，于是我们也不“捉迷藏”了，几个小孩子偷偷商量着跟踪他，看这位“狗特务”要跟什么人接头，要搞什么破坏活动，还煞有其事地让一位同学赶紧去公园的派出所报案，我们认真地尾随那位中年男子，跟踪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他摆脱我们为止。

现在听上去似乎有点荒诞不经，但我相信，这种“抓特务”的真实故事绝对不止发生在我们几个小学生身上。那时，我们被称为“祖国的花朵”，在《中国少年队队歌》里，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这种革命教条的从小灌输使我们对陌生人保持异常警觉的态度。等到了清华附中上高中时，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在一次谈自己学习“两论”（即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时说：“当我们党有一个战斗指令发出时，你没权力问：为什么要发这个指令？你只有这样的义务：党的号召犹如一道考试题，你只有埋头作答，得出符合党的要求的结果！难道在党的号召面前，还容你评头品足、说三道四、指指点点吗？”当时，我们大家都觉得他特别有思想，有见识。

在“文革”前的一段时间，不时有“党内修正主义势力”、“资本主义试图复辟”、“有人架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此类传闻被流传出来，这些小道消息最先在干部子弟中流传。显然是从他们的父母和社会关系处得知的这些内部消息。他们在酝酿成立红卫兵前，听到这些消息个个都是热血沸腾，夜不能寐，有的同学甚至还抱头痛哭，血管里的血液都恨得痒痒的，因为受这十七年以来效忠于毛主席和共产主义信仰的“洗脑”教育的熏陶，这些内部消息不啻于一记晴天霹雳，在干部子女年轻单纯的头脑里炸开了花。

所以，当1966年共产党的最高层发动“文革”，没人觉得荒唐，也不可能以为它违背生活常识，因为社会基础已经扎扎实实地打牢了！充其量是不懂。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学生们中间。具体针对清华附中而言，我就属于不懂的。只是在当时感到非常困惑，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无论是学校本身的教学，还是万邦儒校长，抑或是我们632班的班主任，他们都在一如既往地强调“阶级路线”的教育，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修正主义的了？这让我感到特别奇怪。

马：请谈一谈这种所谓的“亲不亲，阶级分”、“革命就是和一切旧世界彻底决裂”的共产主义教育对您个人成长过程的影响。

甘：在我15岁以前，也就是上小学、初中的那段日子，我其实根本不懂什么“政治”，因为年龄小，当时的小学、初中的学校也没有强调学生要“认识家庭”，有时偶尔也

会遇到一些询问家庭出身或者填写什么表格之类的事情，我都是拿回家让母亲填写。结合当时的社会氛围和我自己的家庭出身，我只是感到很迷茫和沮丧，在潜意识里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本能地感到羞愧，但并没有上升到社会学和政治层面的高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这期间，我家里发生了几件事情，都和家庭成份或多或少有些关联，这些经历对我的思想有所触动，虽然当时我的年纪还小。一件事情是我的姨父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份子”。姨父是一位小学教员，1957年，共产党号召知识份子起来提意见，“帮党整风”，姨父其实是一位非常正统的小知识份子，他就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就他所在的学校丢失财物的问题向学校领导提意见，结果，姨父因为这件事情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农场去劳动改造。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我哥哥身上。一天深夜，警察把我哥哥抓走了，当时，家里人谁也不知道原因，当时我哥哥大概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他在一家工厂上班。事后，我们才知道是哥哥和同事聊天时谈到父亲的情况，我哥哥告诉同事，说我父亲在台湾。那人接下来问了一句：那你可见不着父亲吧。我哥哥接下话茬，说了句：这是早晚的事。本来这是一句随大流的话，但这句话传来传去，到最后演绎成我哥哥期盼父亲带着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因为一句无心的话，哥哥遭到逮捕，虽然后来经过努力澄清，没多久他就被释放了，但他从此在工厂再也抬不起头来，而家里人受此事的影响，都吓得战战兢兢，深感周围危机四伏。

1963年我考入清华附中后，“政治”才开始逐渐地渗透到我的头脑中。作为北京市的一所重点中学，清华附中始终强调所谓“家庭出身”的政治教育，学校经常开大会，万邦儒校长作报告时都会强调学校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教育，告诫学生不能走“白专”的道路。他说，“只专不红”是一条危险的死路，要“听党的话，跟党走”，而每逢召开这种大会，学校都会请一些苦大仇深的典型人物来向学生们控诉血泪家史，借此提高学生们的思想和政治觉悟。这种报告的场面不时会被一些激昂的口号所打断，并进而推向更激昂的高潮。每次大会结束后，各个班级都会布置些讨论会，要求学生写“心得体会”或“思想汇报”，写得好的，老师就会当众公开宣读、表扬、鼓励，并动员全体学生向他（她）学习。

这种精神氛围对我个人成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完全是极端真诚的信奉共产党所说的一切。首先，这在我的脑海中确立了一个坚定的政治方向，认为共产党就是人民的大救星，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理论就是真理，共产主义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归宿。等到这个方向确定下来以后，我要做的，就是要顺应历史，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不能再像小学、初中那样浑浑噩噩，继续虚度光阴，必须积极争取“进步”、“向党组织靠拢”，因此，我必须认识我的家庭，背叛亲情，和亲人划清界限，彻底与旧家庭决裂。

但是，这个“认识家庭”、“脱胎换骨”的过程并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在学校，争取进步的标志是要入团、入党，和其他同学一样，我也向班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班团支部委派一位同学作我的介绍人，我每一周都要写一份“思想汇报”，谈心得、体会，以此向党、团组织表明我认识家庭、靠拢组织的心路历程。这些所谓的“思想汇报”，现在看来荒诞不经，甚至是违反基本人伦和常识的，但在当时，却都是我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自我反省，主要内容是批判、检举、揭发我的母亲和我的整个家庭。即便如此，班团支部对我的“思想汇报”总是不满意，理由是“自觉革命是无止境的”，因此对于认识家庭的自我反思永远不会有尽头。

除了积极争取“入团”，写“思想汇报”这一关不容易过，甚至是永远也过不了而外，在日常生活层面，争取进步的难度就更大了，连我自己都感到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那些“落后”思想简直无处不在，防不胜防！我举个例子吧，有一天，我在麦田边的水渠旁阅读课外

书籍，这是一本反映50年代大学生活的小说。正看着，班主任老师走过来，问我：看什么书？在我心目中，她始终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一直倍受我的尊敬。我告诉她是什么书。于是，她又问了问我对这本书的观感，接着又仿佛若无其事的问了我的家庭状况，我下意识地向她介绍了和我朝夕相处的几位亲人，在那个交流的瞬间，我并没有将她提的这个问题当作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来对待。

谁知到了第二天，班主任老师就在班上不点名地公开批评我，说：班上有人爱抱着大部头的小说看，若是一个人连自己的家庭影响都不会分析、批判和抵制的话，小说中的封、资、修毒素就会和他的心灵遥相呼应起来。一番高论，掷地有声，针针见血，她把小说阅读和认识家庭富有哲理地连在一起教诲，短短几句话就把我对文学作品那种崇拜情绪彻底一扫而光，让我当场瞠目结舌，呆若木鸡。是啊，如果我对自己的家庭背景都如此缺乏警惕性，又怎么能够去辨别小说和社会上的封资修的毒素呢！还有更可怕的，她只是利用一个很偶然的机便试探出我的无产阶级嗅觉是如此迟钝！而那些还没有被她发现的呢？在她不在场的时候呢？想必我头脑中的“落后”思想是数不胜数呀！如此没有阶级觉悟，还争取“脱胎换骨”呢，想的这里，我真的被我的愚钝吓出了一身冷汗，是呀，我深感自己头脑中少了一根弦，太缺乏阶级警惕性了。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对于我们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来说，首先是要认识家庭。认识家庭，除了从家人口中去挖掘家庭过去的历史，还必须从家中的一草一木、一坛一缸中来得到证实。其实，那时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外祖父生前的藏书、生活器皿等，卖的卖了，毁得毁了。不过，相册还保留在那里，它是30代年的东西，我趁家人都在上班，外婆睡午觉的机会，翻开抽屉搜索那些相册：我那个“反动军官”的父亲身着军装，腰间挎着一把大洋刀，威风凛凛地骑在高头大马上，气度不凡地平视荒野的地方。就这么一张照片，足以证明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如果照片上的这个人哪一天真带着国民党的军队反攻大陆，怎么办？还有我的外祖父和母亲等家人的照片，其中有参加宴会的，有举办沙龙的，有旅游、游泳的，等等，显然，照片中的人们活得都挺滋润，散发出浓浓地封建士大夫的老朽遗风和资产阶级的奢靡气息，哪里有一点无产阶级艰苦朴素作风的影子？我当时就想，这些照片都和我母亲那个“职员”的家庭出身没有半点关系，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嘛。

于是，我开始发挥自己的想像力，挖空心思编写“思想汇报”，但总是得不到班主任、团支部的肯定，过不了关，等到这些在我眼里有着重大历史问题的事情都“汇报”完了，我的想像力也就彻底枯竭了，但“思想汇报”还得继续，你必须把自己的心窝不断地往外掏啊掏啊，并且永远没有尽头。到最后，我甚至将母亲爱描眉、爱擦雪花膏，每天上班前总要擦一遍皮鞋的生活琐事也写进去，在我眼里，这也应该算是和资产阶级小姐的生活态度沾点边吧。这还不行，我又回忆出一件事情：在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曾经养了几只母鸡，每当母鸡下完蛋后，她都会旋风般地冲进鸡窝，抓起尚有余热的鸡蛋对着镜子往自己脸上有皱纹的地方抹擦，母亲说这样可以熨平脸上的纹理。

像这种揭发亲人的事情在同学们中间并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它是一个普遍的认识家庭的过程，有一位同学翻出了父亲的日记，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内战连绵，妻小无以为炊，无奈翻箱倒柜，变卖大衣一件。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在大肆攻击伟大的“解放战争”吗？

回忆这些往事令人十分痛苦，现在回过头去看，觉得这像是在说一些荒谬绝伦的笑话，太不可思议了，简直无法理喻，但在当时那种“政治洗脑”的条件下，一切都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对校党委、老师的话完全是深信不疑的，而他们认为自己对学生也是认真负责的。像对我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来说，只有真正“认识了家庭”，

才能拥有一个真正完整的人生，革命的人生，否则，就是没有灵魂的人，变成一具空洞的行尸走肉，那么，整个生命从此也就没有意义了。因此，像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所承受的思想压力实际上比那些出身“红五类”家庭的子女要大上千百倍。他们已经走在革命队伍中等待“接班”了，而我们却还背负着家庭出身的原罪，还必须通过自觉革命，认识家庭，进而背叛家庭的不懈努力，才能拿到一张革命队伍的入场券。

每一次将这样的“思想汇报”递交上去，都希望能听到肯定的、表扬的声音，但事实上，表扬的声音在“自觉革命”的认识征途中犹如春天的甘霖一样吝啬。后来，班里还专门就这个问题开会专题讨论“自觉革命和认识家庭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受到了批判，“认识家庭的目的怎么能急于受到表扬呢？自觉革命的目的也太不明确了！太功利了！”这个结论一下来，大家都不敢吭声了，如果谁再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自己对家庭的认识已经清楚了，说“自觉革命”的目的已经实现了，结局是可想而知的，这恰好证明你和“自觉革命还有距离”！辩证法就是这么神奇。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将一份“思想汇报”的材料交给班主任的时候，她眼神中那种冷漠和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孔，没有支持，没有同情，没有惊讶，更谈不上信任和表扬，她只是冷冰冰地看着我，仿佛我是她捕蝇器里又一只死不足惜的苍蝇，而这是当时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学校生活的大致缩影。

显然，争取进步的表现不仅仅体现在“思想汇报”上，还必须落实在行动上，根据当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1964年秋收的时候，我们全校师生都下到农村去“支农”，这也是惯例，全校师生都排着队，唱着革命歌曲，意气风发地步行到郊区的“人民公社”，并且越接近目的地大家心里就越激情澎湃，我在初中时最喜欢这种和大自然、和农村融为一体的感觉，但这一次“支农”的心态却完全不同，我不得不开始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来对待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

等到达目的地后，站在泥泞道路两旁的贫下中农们咧开黄板牙、舒展着布满皱纹的黑脸傻呵呵的笑着，拍着粗糙的大手掌欢迎我们，在一个院子的空地上，生产队队长扯着嗓子吼话，仿佛不如此粗旷便表现不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你们来俺们这里接受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践的三大革命的锻炼，俺们全体贫下中农表示热烈的欢迎！”接下来，又是一通“阶级斗争”的教育，然后就是开“斗争会”，村里的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和右派齐刷刷地排成一排，他们全身上下散发出一种寒酸的倒霉味，穿着乞丐般的破败衣服，个个蔫头耷脑的站在那里，听任革命群众们的揭批，还有一些贫下中农们在那个用破沙篙、脚手板拼凑起来的批斗台上哭诉自己的苦难家史，为“斗争会”添油加醋。奇怪的是，在我们这些学生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这些“黑五类”们竟然如朽木般无动于衷，我们中一些阶级感情强烈的同学甚至还跳上台去揪打那些“黑五类”份子，每逢这个时候，台上台下就会吼成一片，而这些被挨打的“黑五类”份子，依然无动于衷，仿佛站在那里的不是人，而是一段毫无生命力的朽木。我站在批斗台下，一边喊着口号，努力表现出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一边却心惊肉跳地感受着这种恐怖的斗争场面，仿佛那些被赶上台接受批斗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

这种社会气氛越接近“文革”就越狂热，在学校，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东西，是功课以外的内容。这段时间，“脱胎换骨”成为最响亮的口号，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压力——能否进入大学不再是根据你的学习成绩，而在于你的政治表现，如果你没有什么出彩的政治表现，那么，“家庭出身”就是你唯一的高考入场券。因此，学校和班上对“认识家庭”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弄得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无所适从，最后，我们被称之为“狗崽子”，毫无例外地成为“文革”中“走资派”天然的社会基础，就

这样，鬼使神差的把我们这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和学校的校长、班主任、老师们归属在同一个阶级阵营里，这实在是一件非常荒唐滑稽的事情。

马：请谈一谈您在“文革”中的所见所闻。

甘：我完全是目瞪口呆地眼睁睁看着这场大风暴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这种场面。首先，我不可能去“造反”，我的家庭出身注定我就是个被“造反”的革命对象，而那些被“红卫兵”战将们批斗的“走资派”，都是平时教导我们要“自觉革命”、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校长、班主任、老师，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就是共产党在学校的化身，如果我去造他们的“反”，那岂不就是造共产党的“反”吗？！那时，整个世界仿佛在我的头脑中完全被倒转过来了。其次，我也不可能去“保”那些学校领导、老师，还不说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始终在学校被打入另册，被学校领导、老师另眼相待，受到歧视，没有那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所谓“阶级感情”，光说那些走向前台的“红卫兵”同学，他们立场坚定，言之凿凿，一口咬定学校领导、老师是“走资派”，咬定学校整个儿就是“黑党支部”，他们个个都“根正苗红”，就凭我的家庭出身和思想觉悟，怎么敢去和这些已经红了眼的“红卫兵”战将们去一较高下？更重要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是支持他们的呀。因此，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过来，一切都是那些自诩为“天之骄子”的“红卫兵”战将们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而我就像一片凋零的落叶，立刻被刮到一边去了。

于是，我就在这场风暴眼里漫无目的地流浪，上午去清华，下午去北大，明天去地质学院，后天去北航，“革命派”和“保皇派”相互厮杀，斗的如火如荼，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放下了手中的功课，像蚂蚁一样挤在各学校的大字报区，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喘息声，汗臭味，火辣辣的太阳，相互倾轧着揉成一团，以往的教学秩序瞬间土崩瓦解了。

连外国人也不甘寂寞，淌进这个风暴眼里凑热闹，我在清华大学大礼堂看到大名鼎鼎的美国学者李敦白在演讲，鼓动和支持红卫兵们的“造反”行动，获得阵阵掌声，很快，他又被打成“大特务”，被关进监狱。我还看到一位长得挺漂亮、身穿瘦腿裤的女同学，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群红卫兵团团包围，三下五除二地将她的瘦腿裤撕个粉碎。

在社会上，我体会到空前浓郁的“革命”气氛：公交车内有中学生率众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大街小巷闪现着身穿褪色军装的红卫兵身影；戴着高帽子游街示众的“黑帮份子”怪声怪调地唱着“黑帮歌”，荒诞而又诡异——“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我不老老实实，就把我砸烂！砸烂！砸烂！”

回到清华附中，每天都上演着令人眼花缭乱、心惊胆颤的事情。昔日的老师们有的被剃了阴阳头，有被吐口水的，被拳打脚踢的，有的被挂上“黑帮”牌，这些还算是轻的，重则动用酷刑，被打得皮开肉绽，一些据说受到他们“蒙蔽”的师生们此时正痛哭流涕的悔过，争相揭发他们的“反党”罪行，我心惊肉跳地站在围观者的最后面，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当初拼命“保”校领导、老师的同学，特别是其中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隔三差五就被勒令到学校操场上去受训，女同学被剃了阴阳头，男同学挨揍，这成了家常便饭。罚他们在操场上挖野草，羞辱他们，每个人身边都围着看热闹的男女革命小将，谁挖得不好就招致拳打脚踢。而那些低年级的小同学甚至别出心裁，抓起一把泥土，或捉到一条小虫子，往被批斗的老师、同学的脑袋或脖子里塞，捉弄他们。他们不敢反抗，谁反抗，谁灭亡。

更糟糕的是，他们此时已经完全没有有了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权力。凡遭批斗的同学和老师，被勒令不允许佩戴毛主席像章，有些同学可以忍受无数次在操场上、在教室里的

暴力殴打，可以忍受难以启齿的人身攻击和污辱，但是却无法忍受被剥夺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权力，这让他们痛不欲生，生不如死，这种“政治洗脑”和灌输教育对于人性的扭曲和对人的尊严如草芥般的无情践踏，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那些家庭出身好的“保皇派”同学，虽然能免遭毒打和羞辱，但却在这场运动中失去了话语权，从此抬不起头来。因此，为了表示自己的悔过自新、将功补过，他们中间有些人表现得往往比先前那些红卫兵战将们更抢眼、更激进。在631班，有一位姓王的同学，他的家庭出身好，在“文革”初期是校党委的铁杆捍卫者，等到学校“党委”被定性为“黑帮”、“走资派”，被打倒之后，为了突出自己，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在对那些先前同他一样的“保皇派”同学，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进行施暴时，那种残酷、残忍的程度比那些“红卫兵”战将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曾经亲眼目睹过631班组织的这种批斗会，连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吓得腿都直打哆嗦，抖个不停。

马：请谈一谈您在“文革”中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两件事情。

甘：“文革”初期对我们班班主任老师的批斗，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记得，就在先前班上组织的春节联欢，我们班一些同学还抱着班主任的小孩亲热，逗笑，到了1966年8月份，还是这些同学，突然拉黑了脸，抄了班主任老师的家，据说，抄家的时候，班主任只说了一句话，说：家你们可以抄，别吓着孩子。

我们班的“红卫兵”还在教室里组织对她的批斗，我们班的情况比较特殊，干部子弟比较少，而在“文革”初期，红卫兵主要是由干部子弟构成，因此，在我们班，“红卫兵”核心小组的成员相对弱势，没有太大的号召力，组织不起来像模像样的“批斗会”。于是，在批斗班主任老师的时候，这些干部子弟就拉来家长助阵，还请过来一些贫下中农的老头、老太太陪斗助威。当时，班主任老师跪在教室的讲台上，有一个抽旱烟的老太太，用特朴素的阶级语言揭批她，说：你把我们的孩子往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引，安的是什么心！边批边不时用旱烟枪头朝老师脑袋瓜子上敲一敲，这个场面令我印象很深刻。

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家的邻居们身上，我们家原本住的是个大院落，“公私合营”后，私人房产充公了，我们这个院落搬进来很多住户，人员构成也变得很复杂，有一位在澡堂子里搓澡的女工人，她出身于“红五类”家庭，在“文革”期间，她表现得非常积极，带上红臂章，逐门挨户的警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们院里本来还住着一户“右派”家庭，这户家庭的父母被流放到黑龙江劳改去了，只剩下一对还没有上学的小姐妹，这位女搓澡工硬是强迫这两个孩子坐上火车去东北找父母。“文革”中，像这种人在北京的老胡同巷子里有很多，我们院子后头的一条胡同巷子住着一位姓林的老太太，她的家庭成份是“地主”，丈夫在先前的政治运动中被共产党给“镇压”了，但是，她依然保留了先前的某些生活习惯，穿戴干干净净，平时保养得比较好，还经常爱搓点麻将，总之，生活方式很前卫。结果，在“文革”中，这种“地主婆”式的生活态度很快被邻居们检举揭发了。这样，凡是和这位老太太有过往来、有牵连的人无一漏网，一一被集中到她家接受陪斗，我外婆因为曾经和她一块摸过几把麻将牌，因此也没能幸免，她被“红卫兵”战将们押往这位林太太家，被勒令揭发交往过程中她的“反动”言行。为了表现和林太太划清界限，这些与林太太有过交往的老人们被迫纷纷检举、揭发她。这位60来岁的林太太遭到轮番鞭打，而鞭打她的人，正是她唯一的独生子，此时，林太太的儿子正在念中学，生得高高大大。至于那些“红卫兵”战将们，则站在一边，监督对这位阶级敌人采取的专政行动。那位林太太就在当天晚上因拷打伤势过重去世了。我外婆魂飞魄散地亲历了这一幕，回到家后，筛糠不止地悄悄换洗衣裤，她被吓得当场排泄失禁。而且，外婆本来一直患有抑郁的摇头症，此后便越发严重，即使在睡梦中，她的下巴颏也会不由自主的左右摇摆个不停。

不过，我的家庭出身虽然有问题，但在“文革”期间却没有受到过批斗，没有挨过整。因为老师平素对我并不待见，所以我在班上本来就是一个被边缘化的角色，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政治表现，在“文革”期间，这反而变成了一件好事，既不惹人嫉妒，也让别人感受不到我有什么威胁，因此没有被卷入到各个派系的斗争之中。另外，我较为瘦小，我的外号叫“干鸡”，平时少言寡语，一直以来，我都是属于不怎么惹人关注、被忽略的那一类人，因此，也没有人想到要来批斗我。

我被这场运动远远地抛在后头，但即便在此时，我依然积极主动地争取思想上的“进步”，那时，我一直虔诚地相信共产党和毛主席。在我眼里，在那段“红海洋”的日子里，像张志新、林昭、遇罗克那样优秀的人是少之又少的，即便是那些遭受过虐待和迫害，被打成反革命份子、坏份子的人们，大多数也都和我一样，虔诚地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当这些人临终之时，还有人强烈地希冀“加入中国共产党”，足以见意识形态灌输对人们思想影响的程度达到了何种地步！

“红卫兵”们不允许我们这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闹“革命”，于是，我就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进行“自我革命”，我甚至还一度自认为自己的革命嗅觉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比如，我和一些家庭出身类同的同学窝在宿舍里，专门研究《欧阳海之歌》的封面上是否有反动标语，在“回力”牌运动鞋的鞋底纹路上寻找国民党党徽，逐字逐句地推敲校长、班主任、老师们的讲课笔记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

不仅如此，我还继续在“认识家庭”的征途上越走越远，学校掌权的红卫兵战将们除重点抄家外，更是动员“自觉革命”的同学自行抄家，我当然不甘落后，把我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那本相册，从家里抄来交给学校红卫兵。有一次，我回宿舍时看到学校医务室的门敞开着，里面散乱地堆放着同学们从各自家中抄来的物品，其中就有从我家抄来的相册，至于那些相片则散落一地，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锦缎戏装、绣花小脚鞋、高跟鞋、玻璃丝袜、古玩器具，等等。看到这些，我突然感到有一种落后于革命形势的心理危机，觉得自己从家里抄来的东西太寒碜了。那一刻，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从家里抄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我心里琢磨着，我那个作为“封建官僚”的外祖父曾经当过清政府巡抚一类的大官，一定有什么传家宝留下来，只是我不知道家里人藏匿在什么地方；还有，我那个人在台湾的父亲，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干过，而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抢掠，他就没有从中聚敛几个“国宝”之类的东西？我甚至还鬼迷心窍地幻想家里的地窖里藏有成吨的金条。

当然一切都子虚乌有，但我并没在“认识家庭”的征途上因此而停下脚步。于是我干了一件令我至今都无法原谅自己的事情：

就在“文革”初期，母亲偏偏和一位男士交往起来。这位男士大我母亲十来岁，看上去是位知识份子，生着一副清癯、睿智的脸面，戴着一幅金丝边的眼镜，穿着浅灰色、带着格子纹路的西服，每次来我家，他的皮鞋都擦得锃亮锃亮的，还拄着一根文明棍。母亲和他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每次他们在一起，母亲就很开心。我感到非常不满，“文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居然还有人置身事外！这不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典型表现吗？但这种情绪只是在我心里慢慢地积蓄着，并没有表现在脸上。

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回家，刚进院子，就看见一些“红卫兵”小将们正在揪斗那个西服革履、拄文明棍的老者，邻居们都在围观，而母亲、姐姐、哥哥也一声不吭在旁边看着，我心里打了一个颤，有点尴尬，有点慌张，也有点激动。这些“红卫兵”小将们将这位老者团团围在中间，问他到这个院子里来找谁。老人吱吱唔唔着不肯说。显然，他

们并不了解底细。于是，“红卫兵”小将们便开始揪他的领带、批判他的那幅行头。这时，我头脑一热，冲着这群“红卫兵”小将，大声喊道：“他找她——我妈！”我指着站在院子我家台阶前靠着廊柱的母亲，紧接着，我的嘴里就像机关枪扫射一样嘟嘟嘟嘟往外吐个不停，我至今还记得当时自己说过的那些揭发、批判母亲的话：“你们看，我妈多爱美，看她的拖鞋，还是花的！绣的是大花！”

整个热闹非凡的批斗场面一下子安静下来，这些“红卫兵”小将都穿着褪色的军装，但显然大都是低年级的孩子，看见我这个大哥哥如此言辞激烈的批判、抨击自己的母亲，竟然一下子都呆住了，居然不知怎么应对接下来的场面！也并没因此扑上来批斗我母亲！接下来，他们只是喝令老人脱了西装、摘下领带，让他从这个院子里“滚蛋”——我们院里这场批斗大戏就这样戏剧性地落下帷幕。后来，我再也没有见那位老知识份子出现过。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这个场面却不时地浮现在我脑海中。每当我想起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想起故去的母亲，想起她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姐弟几人拉扯大，那么不容易，我就忍不住泪流满面。这件事成为我终生悔恨不已的一件事情，同时也成为我痛恨灵魂被操控，痛恨谎言和欺骗、还有所谓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原因之一。

马：在“文革”期间，您的家人有没有受过迫害或遭到不公正对待？

甘：严格来说，在“文革”中，我们家并没有受到红卫兵的严重冲击。我哥哥在工厂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二级工，而姐姐当时在工艺美术学校还没毕业。母亲在单位曾经被勒令写过“思想检查”，要求她向党组织坦白交待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台湾人。不过，在被勒令反省的那几天，她像先前一样，照常地上班下班，我并没有感觉出母亲背负有多么大的心理压力。一天晚上，她还让我替她写一份“检查”材料，而这恰好是我的长项，在学校，我写过不计其数的“认识家庭”的反省材料，我一挥而就。但母亲看完我写的材料后就那么随手一扔，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说：还有这么写东西的哪！又很是鄙夷地说：“瞧你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呀！有这么糟践自己的吗？算啦，还是我自己写吧。”我不知道母亲最终写没写。但此后我们家依然平安无事。

我认为，我们家之所以没有受到当时“红卫兵”的冲击，全有赖于母亲在1949年时刚建立个人和家庭档案的时候，她所做的，她在自己的婚姻一栏内填写“离异”两字，而我们姐弟几人也都改随母姓，这相当于和我的父亲彻底地划清了阶级界限，因此后来母亲才被定了“职员”而不是“反革命家属”的成份，在那个注重“阶级成份”的年代，这对于个人和家庭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我们家就孤儿寡母几个人，这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是被边缘化的家庭，不惹眼，不招人嫉恨，就像我自己在班上的表现一样默默无闻，这可能也是一个因素。

应该说，我们家在“文革”中的危机主要是来自家庭内部——来自我这个“叛逆”。在当时的年代里，任何人都会被那种疯狂的社会氛围所感染，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真实和顺理成章，什么叫不可抗拒，什么叫“历史潮流”，什么叫“革命”和“进步”，你只有身处其中才明白其真实内涵。你只能跟着那些“红卫兵”、“造反派”们一齐起哄，否则你就是“阶级立场”不稳，“阶级感情”不深，“阶级觉悟”不高。而那些挨打的都是“黑五类”，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所以抄家、打人就变得那么地合理和顺乎自然，并且这被认为是力求“上进”的表现。

我记得我们学校的一位姓宋的干部子弟，他是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发起人之一。他在1966年8月2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怒火冲天，抄家抄出英国指挥刀、日本大马

刀、北洋军阀将军服、匕首等等，真是阶级报复，阶级仇恨，我们再不能容忍了。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这是阶级斗争，你打他，他杀你，这是你死我活。不过我从来没打过人，还有些‘温良恭俭让’，没有最深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这很危险，对敌人的恨不深，就是对人民爱的不深。你现在可怜他，他杀你时不可可怜你。要敢于斗争，勇于树敌。”

而这位姓宋的同学在当时竟然还算得上是一位“理智”、“温和”的“红卫兵”，因此可以想像，当时的社会氛围有多恐怖。而在当时，“恐怖”这个概念并不像今天这样臭名昭著，它是合法的，是一种荣耀，经常被“红卫兵”们挂在嘴边，就叫“红色恐怖”。

还有一位叫张明（与被流放到新疆劳改的张明同名）的干部子弟，是我们632班“红卫兵”创始人之一。我听说张明在“知青”下放临行前，特地找到家庭出身“不好”的一位叫戴建中的同学，发表临别赠言，这是两人自1966年“文革”发动以来的唯一一次交谈，张明对戴建中说：“你们是地富反坏资产阶级，我们是工农革干。二十年后见”。然后，张明坚定不移地走出了教室。这种以“阶级立场”为导向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并没有得彻底地清算，并且一直若隐若现地存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头脑和人际交往之中。

到今天为止，官方对“文革”中的受难人数都没有一个准确数字，有民间学者统计，在“文革”期间遇难的受害者至少达数百万之巨，而他们的家庭肯定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苦难。相比之下，我们家还算平安的，我认为，“文革”的危害，除了拷打、虐待、流放和死亡，更严重的是，对整个社会道德人伦的摧残和精神的毁灭。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剥削有两种，一种是血汗压榨和肉体消灭所造成的个体磨难和痛苦，另外一种，是对精神的欺骗和榨取，后者的性质应该是更恶劣的，直到今天，这个民族都没有真正地反思、反省过“文化大革命”，这恰恰是由于对人们的精神欺骗和榨取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马：请您谈一谈对“文革”中的生活体验以及对“文革”的看法。

甘：凡是当年大专院校的学生或是中学生，亲身经历过“文革”全过程的人，都心知肚明：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自觉自愿地投身在这场运动之中。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如果否认这一点，是不诚实的。意识形态领域盛行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阶级斗争”理论、“培养革命接班人五项标准”，等等，再加上鼓吹历史发展“五阶段”的所谓“进步论”。作为未经世事、思想幼稚的学生们来说，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去辨别和抵制。在当时，无论是大人、还是学生，都是共产党号召什么，责无旁贷地响应什么，用党的语言来说，每个人都必须紧跟形势，如果跟不上形势，就会被历史淘汰。

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像“镇反”、像“反右”、像“三面红旗”、像“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地能够在中国运动起来，它绝对不是凭空产生的。像在“放卫星”期间，一些报纸上报道的某某地方“亩产粮食上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些明显违反生活常识的谎言都能够大行其道，并在人们的观念中被接受，因此，后来出现的“文革”中一个家庭相互为敌、四分五裂、必欲置亲人于死地而后快的荒诞事情，其实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对于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们来说，追求“上进”的唯一表现就是听从党的召唤，不仅仅对我本人是这样，时刻敦促自己“认识家庭”和“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在当时，又有多少追求“上进”的同学将自己每日写下的日记交给学校的党、团组织呀！结果，在“文革”期间，那些真实地记录下自己和家庭琐事的日记，成为自己思想反动的“反革命”证据，从此再也没有翻身的日子。我身边的一位同学就是如此，他将自己的日记上缴了，结果不但自

已被划为“右派”学生，而且还因此将家人卷入进来。我十分庆幸自己那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否则我肯定会全部上缴的，现在想起这些事情都觉得后背发凉。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本质有所认识是在1971年林彪一家人坠亡蒙古温都尔汗之后。在此之前，我满怀激情地奔赴山西太行山的一个只有九户人家的小山村“插队落户”。当最初的激情过去，冷静下来的我发现，在这个小山村里接触到的人和事，完全和党的政治宣传沾不上边，但我此时还徘徊在真相的边缘，心里只是有些疑惑。在修“大寨田”运动中，我充当突击队员，在生产队里抢修和开发新的“大寨田”，这是重体力活。有一次，突击队的队长，一位老共产党员，对我说：“你们插队的学生哪里知道，共产党厉害呀，比小日本厉害多了！”他指的是1958年“大跃进”吃“大锅饭”的事情，家家户户不允许在自己家里开伙，不允许私自藏匿粮食。但是，农民家里祖祖辈辈都有家里存隔夜粮的习惯，因此，公社的干部们便让村里的共产党员带队，挨家挨户搜粮食。“日本人占领时也搜过粮食，汉奸带着，可他们就是搜不着哦，但共产党一搜，没有一家能躲过去，全被搜了个底儿掉！”

等到下放的“知青”返城过春节，一些闲不住的、活跃的、平时关系处得不错的学生们就聚在一起，交换信息、谈心得体会、聊奇闻轶事，讨论政治运动的走向，互相“跑书”，这很重要，互相之间开拓眼界、彼此启发，这时，同学们的思维不再像被圈禁在学校里那样了，创作“地下”歌曲，收听“敌台”，一些活跃的学生还组建了一些沙龙，我们那个中学生沙龙被其他沙龙的同学戏称为“二流社”。我逐渐开始反思“插队”本身的问题，这在现实中哪里像是党所讲的那样——“走与工农相结合”的“五四”道路，这完全是瞎扯蛋嘛，连马克思都说“粗糙的体力劳动并不能改变世界。”这句话被我抄在笔记本上。

而在我“插队”的那个小山村，在我们去之后第三年才通上电，农民们世代代都是在山里头靠肩挑背扛糊口度日，这是他们的真实生活，难道靠“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能创造出一片新天地？问题是，从1949年开始，都移了二十多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但这里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好一些，农民实际上也并没有像宣传的那样，过得多么幸福，甚至连那些老共产党员都对“文革”牢骚满腹，怨声载道。每每想到这些，我的头脑中就不由得浮现出那几年高音喇叭里没日没夜都在播放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这首歌，这时回味起来，意味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似乎听出了别的东西，这就像跟小孩子斗气似的，你说“文化大革命”不好，我就偏偏说好！

这些真实的生活体验给我完成一个自我救赎和自我启蒙铺垫了一个心理基础，后来，毛泽东针对郭沫若发表《十批判书》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自这首诗发表以后，又掀起了“批孔”的政治运动，这时，我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既然“百代都行秦政法”，那么，我们先前所受的教育，什么“共产主义”、什么“社会主义”，这些崇高的理想事业那不都是胡扯吗？既然“百代都行秦政法”，那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开展的“与传统决裂”、“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都是哄我们这些学生瞎起哄架秧子哪！折腾来折腾去，原来还是在行“秦政法”呢！还有什么“反修”、“防修”，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闹了半天都是瞎掰，到了这个阶段，我的心里就产生了一种深深地被愚弄、被欺骗的感觉。不过，正因为如此，我也看透了许多以前感到迷惑、总是让心里添堵的事情，既然如此，我还跟着起什么哄？于是，我就把一直悬吊着的心情整个儿给放松下来，并且认为自己已经从恐怖的红色泥潭中脱身而出了。

话虽如此，但这么多年来接受的政治教育，要求我们学生关心政治形势的习惯却改不了，不过，我学会了在舆论封锁中巧读“两报一刊”和《参考消息》，从它们的只言片语中筛选出真实资讯的本领，比如，我从党对柬埔寨“红色高棉”和波尔布特的吹捧中，意识到柬埔寨正在发生“红色恐怖”和种族灭绝的迹象。1974年，波尔布特来到北京，受到毛的接见，毛向波尔布特推荐了姚文元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文，在中国期间，波尔布特还见识了“大跃进”、“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而在朝鲜，他又见识了“千里马运动”，回到柬埔寨，波尔布特结合柬埔寨的“国情”推行柬埔寨特色的所谓“共产主义革命”。等到了1975年，当波尔布特再次来到北京时，毛盛赞波尔布特“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由此，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今天，柬埔寨“红色高棉”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正在一一被昭示出来。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文化大革命”，他们无疑都是这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但是，我认为仅有这一点认识是不够的，正是他们，成就了这尊“神”不可撼动的神圣地位，也正是他们，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当今这种畸形的现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或多或少地扮演了某种不光彩的角色，哪怕像我这种家庭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父亲又是台湾人的年轻学生，都主动卷入到揭发和批判亲人的行列之中，更惶论其他人，我认为，反思历史的时候不能把自己排除在其外，不能用一种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这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今天，很多问题都很清楚了，只要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社会进化论理论依然被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人类被一种魔幻般的意识形态所吞噬，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在其中被视作一种纯粹功能性的存在，被抛掷于伟大的历史进程的高歌猛进之中，只要它依然被视作一条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进化道路，那么，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抑或别的什么更动听的名义，都不会对我们的境况从根本有所改观，这是由它的意识形态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我这么多年思考下来得出的一个结论。

（全文完）

作者注：因年代久远，受访人可能在记忆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偏差或模糊，敬请当年的“文革”亲历者或参与者提出补充、修正以及各种反馈意见。此外，如有“文革”亲历的读者希望向外界坦陈当年的人生经历，请发送邮件至 wengeyixiang@gmail.com，作者将代为编辑，并发表。谢谢！

□ 原载《共识网》

~~~~~

## 【风雨人生】

### 一个老外的红卫兵经历

• 米鹤都 •

（按：柯马凯（Michael Crook），英国人，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其父戴维·柯鲁克，为抗战中来华的英国共产党党员，后长期在华工作。柯马凯1951年出生于北京，为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初中1968届毕业生。文革中为北大附中红旗的成员，后因受父母牵连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在工厂做工4年。本文作者根据对他的多次采访，撰写了他的口述史“老外红卫兵”，已编入《回忆与反思》口述史丛书第三册，本文摘自其中一部分。）

◇ 中国缘

我家跟中国的因缘是很深的。首先，要从我的外祖父母讲起。大约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当时西方耶稣教派也有一个类似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那么一个势力划分范围，所谓免得大家都重复建设什么的。所以，当时的基督教救世的传教活动，也是这样按国籍分的，比如说福建、长江中下游归英国等，河南、四川两个省份就归加拿大了。这是当年耶稣教派内部的一个分法。

我姥姥姥爷都是加拿大人。他们之前不认识，但是双双成了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他们在四川相识，在四川结婚。结婚以后呢，基本上就一直在四川，我妈就生在成都。当年，加拿大的天主教和耶稣新教派在中国传教有一个区别，天主教是搞慈善事业，什么孤儿院这个那个的比较多；新教派主要靠社会公益事业作为传教途径，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耶稣教的基本上就这两个，他们要么办医院，要么就办学校。北京好多学校，如汇文中学什么的，就是这种性质的。加拿大人在成都就办了华西医学院，现在就在川大的校园。

姥姥姥爷一开始住在一个叫四圣祠的胡同，我妈生在成都时是在那里，后来我妈妈基本上就是在川大的校园里长大的。我妈长大之后，大学是回到加拿大读的人类学，读完一个硕士学位就又回中国来了。然后，她要做人类学研究，曾跑到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什么藏族啊、彝族啊，去做研究。

我爸叫戴维·柯鲁克，是英国人，我爷爷奶奶原来基本上属于中产阶级，家里还有点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遇到1920年前后的那次经济危机，他们都破产了。大约在1920年代末，我爸就跑到美国上大学，到那又赶上1929年的大危机。不过，他好歹已经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在那种环境下，左派一下子就起来了。我爸参加学生会啊，后来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啊，美国的共青团。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以后，他回到英国，1935年我爸就成了共产党了。他在美国是共青团员，这时加入的是英共。1936—1938年西班牙内战时期，共产国际组织了国际纵队，我爸就加入到国际纵队当中。我爸当时受伤了，住的医院正好是白求恩所在的医院，在那里治疗啊、养伤什么的。那里，当然有很多左派了，那个圈子里大家都关心国际时事，当时日本侵华事件一下子成了大家关注的热门。然后，斯诺写的《西行漫记》那本书，刚刚出版就传到这里。我爸是在西班牙养伤时看的这本书，当时白求恩他们这个圈子里头就有一些知识分子喝酒聊天，就对中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 ◇ 西班牙内战时期的父亲

等到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不是有一批医生来到中国支援中国抗日嘛。我爸不是个医生，可他也在1938年来到中国了。不过，他和白求恩等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是带着共产党或者说共产国际的党的关系到中国的。这样，他先去了上海，在圣约翰大学教了一段书，然后就去了内地，在四川认识了我妈。他们俩是不是一见钟情不知道，反正是几见就钟情了。

当时，我妈从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好像社会特别腐败，剥削特别痛苦，她特别同情底层的大众。然后经过我爸一说，好像很快就被感化了，我妈就放弃了基督教变成了共产党。我妈虽然是加拿大人，可她加入的是英共，她也成了英国共产党党员了。那个时候好像是有妻随夫的国籍，一嫁谁就从谁的国籍。反正我妈用英国护照用了有二十来年，可是后来她不用了，又恢复了加拿大的国籍了。所以，我现在是双重国籍，加拿大和英国的双重国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早期他们都在中国，本来说要去延安。可是，后来希特勒法西斯一攻击苏联，整个形势就变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发出号召，这是一个保护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了，号召凡是同盟国的共产党员都应回本国参军参战，抗击国际法西斯。这样，我父母就都离开了中国。我妈加入了加拿大的军队，我爸是参加的是英国军队，在皇家空军服役。他们都离开了中国。

战争结束后，英国和加拿大都有资助退伍军人上大学的政策。我爸就进了伦敦远东学院，我妈就去了伦敦经济学院，想读个博士。他们当时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因为他们作为共产党员的理想，很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讲的是长征这段革命历史，是中共领导人的这些事。那么，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到底要搞些什么，特别是它的农村政策究竟要搞什么？关键问题是土地问题。我父母就想写这个，于是决定到中国去研究土改。他们就带着英国共产党的介绍信，在1947年又回到中国。

他们直接去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后来就在涉县，做一些调查研究。1948年他们就开始搞土改的普查了。后来，他们合著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从社会学的角度描述和记载了中国的土改运动。随后，他们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筹备建立，就留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

#### ◇ 我的童年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也是出于对中国的感情吧，我父母就基本在中国定居了。我们一共弟兄三个，我是1951年在北京出生的。

以前，外国传教士的孩子和中国社会隔离的特别厉害。因为教会有规定，就像现在北京外国人住在北京的别墅区，孩子上国际学校什么的。我妈是传教士的孩子，但她特别反感这个。她认为我们既然在中国，就得入乡随俗，和中国人一样，所以就坚持要我们哥几个都上中国的托儿所、幼儿园，直到小学、中学，不去搞那个洋化。

小时候我在中国上学，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很奇怪，很难接受的东西。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是从外国到中国来，他还能对比一下外国是怎么样。可我也没去过什么外国，我一直在中国，实际我的感受和中国的孩子差不多。要说小时候有一些触目惊心的印象，还是能感受到的。尽管我1951年才出生，但是我对反右斗争就还有点印象。我记得有一回我跑到北外的东院，看见一些大字报贴在墙上。有一些是什么老师、什么阿姨，怎么画得面目狰狞，漫画画得那么难看。本来大家一团和气，怎么突然这样了？

对大跃进我就印象更深了。因为我们北外西院里建起了一个小高炉炼钢，我记得特清楚，现在还知道那个小高炉的具体位置。为什么记得清清楚楚，是因为当时“炼钢”要拣废铁什么的。我们拣了好多钉子什么的，唉，小孩们看一个高炉烧得热火朝天那么旺，然后拣点东西往里扔，可高兴了。当时有人拣了一些可能是生铁锅什么的，估计碎铁块太大，塞不进去，然后有人拿那个锤子砸。砸东西多好玩啊，那时候我7岁吧，我记得特清楚，我跟一个大学生说：唉，让我来砸吧。他就把榔头给我了，让我砸。那个榔头，一头是带尖的。对我来说榔头还是太重了，我一举起来把持不住。砸什么废铁呀，往下一沉正勾着我后脑勺了，还流血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

还有困难的时候，我也记得特清楚。那是大家都吃食堂嘛，我们从小吃食堂，我就意识到这伙食怎么越来越糟糕。我们的阿姨对我们哥仨，就专门说我：Mike是好吃的多吃，不好吃就不吃。由于我特别挑食，就特别容易感受到伙食不好了。后来我们吃食堂的时候，我

父母对我们的教育特别严格，不许挑食。给你多少你就吃多少，而且吃完了算，吃不完你甭走。当时食堂里那熬白菜特难吃，父母就盯着我，非叫我咽下去。他们有几回稍微看得不严，我就乘机给倒了。那期间，我倒没有饿着，不过伙食确实不好。后来，我就问我妈，怎么搞的，过去我们吃的挺好的，现在怎么越来越糟糕啊。我妈是这么解释的，其实不是说大家原来都吃的好，原来是特殊照顾我们，所以我们吃的好，现在我们吃的和老百姓都一样了。哦，这么回事，原来如此。

可能是父母想教育我们彻底平民化，和中国的群众打成一片，和中国孩子完全一样，不搞什么任何的特殊化。所以，我上完了三年级，他们就把我们都转去上寄宿制的崇文小学。当然，崇文小学其实也是特殊化，什么外交人员的孩子啊，在外地的军人子弟啊，其实也是特殊化。不过起码有一点，我们去的时候，外国人一个都没有，就我们哥仨。可是我们哥仨转到崇文小学后，北京一些外国专家等一听说，唉，怎么柯鲁克他们家三孩子都上了寄宿制学校了？不错啊，我们家孩子行不行啊？他们就都纷纷往那儿转。等我上六年级毕业的时候，崇文小学差不多有二十几个外国孩子了，都成了北京的一个国际学校了。

文化大革命，在1964年就有点迹象了。上六年级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很出名的戏，“以革命的名义”。然后，到处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政治上，因为我父母都是共产党，所以他们特别关心社会主义建设等政治问题。我回家以后，尤其是我爸总是爱讲些政治方面的东西。他们当时对毛泽东这一套都接受，而且很积极。由于他们很左，后来在北京的外国人，给我父母这个圈子或者说这一派人起了一个外号，叫“百分之三百”。意思是说，他们绝对是百分之三百的布尔什维克，就是中共提出什么，他们就三倍地拥护。那时候我父母左得厉害。

我记得六年级写作文的时候，可能是受我父母政治上敏感的影响，我的一篇作文，还引用了一些毛主席语录什么的。然后老师看了以后说：哎，你还跟得挺紧的。反正我的政治化的作文得到了表扬。

文革前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教育，对我来说完全是理论上的，我并没有一个什么阶级斗争意识。因为我觉得区分阶级敌人太难了。中国那个时候是处在被围困那么一种环境中，什么帝国主义的包围圈什么的。我觉得人们普遍有一种抵御外国的情绪，这个警惕性我倒是挺高的。文革前，我回英国“留”了一年学，实际上对我来说是出国。我们是先到香港，再到英国。我记得我走在街上，还指着一些人跟我爸说呢：唉，那是特务吧？那是帝国主义什么的。我那时就很有这方面的防范意识，一出国就觉得眼前这些人里恐怕有好多是坏人。

#### ◇ 文革初期

我小学完了考中学，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101中。由于考分不够高，人家没要我。我第二志愿报考的是北大附中，我就这么上了北大附中。

那时候，北大附中是一个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地方，我的同班同学里头就不少。北大附中也有一些外国人的孩子，我们班就有3个。有一个米马克，他爸是搞工会运动，可能是美国码头工会什么的，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他们家是属于后来从美国过来的，1965年到北京。他哥哥叫Chns，中文名字叫米克里。米克里金黄的头发，蓝眼睛还是绿眼睛，长的挺壮，穿着个棉猴。这个人特革命，跟人一块开忆苦会时，可他是忆美国人的苦。他说：资本主义就是苦，美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整天净吃窝头。我们问他：美国的窝头什么样啊？他说：就是Muffin，那就是窝头。我们当时都被唬住了，还信以为真。多年以后，我们发现那个美国“窝头”——Muffin，多好吃啊。他家里人那时也挺左的，后来他父母可能



是文革期间受了惊吓，1969年前后回美国了。听别人讲，他们和那段经历决裂了，再也不提这事了。米克里回美国以后就吸毒啊什么的，整个就不可救药了。

由于我们这个家庭对中国政治的热衷，所以文化革命运动一发起，我很快就接受了，并且高高兴兴地投入进去。北京有一帮子干部子弟，外地没有这么个规模，没这么大量。这帮人在政治问题上很敏感，而且特牛。我觉得这是个关键，我想北大附中“红旗”由谁挑起来的，都是那些特牛的、初三的和高中的干部子弟。号称是“牛宫彭”，即牛晓平、宫小吉、彭小蒙。所以我说，红卫兵一个是政治敏感，一个是有背景，但挑头的都比我们大，是我们这拨人的哥哥姐姐。

那幅“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出来后，我觉得我当时没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认识，是不是人的政治觉悟还有什么遗传因素？我们班上一些同学议论这个事，就认为是这天经地义的。可不嘛，我们是打天下的，他们被打下来了，那家里肯定是怀恨在心，是要择机反攻倒算的，那是人之常情嘛。我得老实的说，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是有那么个道理的，并没有觉得这个思想不合理。不过，我也没主张和宣扬这个观点，没有想去说服谁。当然更谈不上站出来这个血统论怎么不对。总之，有人这么说，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吧。

北大附中“红旗”组织起来的时候，同学们就比家庭出身，还按论资排辈。一说谁的父母是共产党员，还得问是什么时候入的党。好，我说那我爹是1935年入的共产党，也就是说我们弟兄几个的“家庭出身”没问题。我觉得红卫兵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朋友的私交关系。孩子们平时玩都是抱团的，那些爱折腾的往往就凑在一起了。我从小就淘气，属于爱折腾的，我要好的几个同学不是学习最好、最认真的，都是喜欢折腾的人，比较闹，在宿舍里那可好玩了。文革开始后，我们就积极参加了。人家那些文绉绉、爱学习的同学，他们可能对这个不那么感兴趣。

从年龄讲呢，我觉得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喜欢闹事。比方说，我后来在1968年就处于一个鬼混的阶段，在友谊宾馆结识了一些外国人。有时我们聊天，有个瑞士人就说：嗨，这文革，都是这些年轻人犯青春病，是荷尔蒙激素跑到血液里了。这本来应该是跟男女之间的事有关，结果中国年轻人的荷尔蒙跑错了地方。我想，这也有可能是红卫兵的一个因素。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社会上的大背景，有那么一个气氛吧。

北大附中红旗当时还有个队部，在高中楼里。进了那个大堂，左边那间屋子就成了红旗的队部了。当时一天到晚熙熙攘攘，跑到那去的人有的是办正事的，有的是瞎折腾。我们班大概有三十几个学生，可能有那么十来个参加了红旗。如果说学生有三类人，一种叫逍遥派什么的，他们也不想加入。不过话说回来，他们即使想加入，红卫兵也不要。还有一种人，挺想参与，但是由于出身不够好，或人缘不好，红卫兵也不要。其实这些有的是借口，本来我们以前就是抱团的，属于特淘的，本来就要好，干什么我们都在一起，他们想进来我们都不要。

那时候，学生们都喜欢穿军装什么的，特别是红卫兵们。我挺要好的一个同学，他是部队大院里的孩子，我和那帮人挺合得来的。那时候和他们在一起玩，他们就给我弄一些军装。我也经常穿军装，觉得特别方便，那么多兜放什么都合适。后来，我也养成一种习惯，穿军装，还弄个带大铁扣的皮带。大家都说，这皮带抽人、抡人用得上。可是我就一直没用上，没抽过人。那时候反正也不上课，我们经常到处串。有一回，他就说到他们家去玩，我们就跑到红山口国防大学那个院里去了。那大门都有警卫，不让外国人进啊。我这外表一看就是老外，还有点担心。他说：穿军装没事，要问你的话，你就说是新疆人，没事。结果我这身打扮，就混进去了。

## ◇ 文革中的外国人造反

文化革命中，在北京的外国人主要是些专家，他们当时也分好几派。像马海德啊，路易·艾黎这些人，我的印象一开始他们就不支持文革。他们好像就觉得，我们是老革命，文革受冲击了。还有一种是以爱德乐为代表的，一开始就不感冒。就是说我们是外国人，这是中国人的革命，咱们靠边，不要去掺和。但是，再有一派像我父母这样的，像阳早、寒春、李敦白、史克等，又写大字报，又要造反，今天参加这个大会，明天去批判那个，就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是自己的革命了。所以说，在北京的外国人文革中有一派是反，有一派是旁观，还有一派是积极参与。

当时，阳早、寒春等四名美国专家写了大字报，要求不搞特殊化，要求和中国民众一样参加文化大革命。然后大字报就转上去了，毛主席看了以后做了批示。这个“9·8批示”大意是：他们及其子女如果愿意，应该欢迎他们参加，让他们跟中国同志一样。这张大字报的背景是因为文革开始时，外事管理部门有“内外有别”的特殊政策。意思是，中国的文化革命跟你们没关系，你们靠边。所以，这些人感到自己是全心全意地参加中国革命来的，把他们排斥在外，特别不高兴。“9·8批示”是毛主席专门就外国人能否参加文化革命的指示，这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之后，一批外国人就成立了一个老外的群众造反组织，叫“白求恩延安”，积极地投入到文革当中。我父母都是这个“白求恩延安”的。当时在京的外国专家大都住在友谊宾馆，有了主席的批示，外专局就得提供方便啊，于是就把南配楼的一个会议室免费使用，作为“白求恩延安”定期在那开会。

这些大人们成立了革命造反组织，我们这些孩子们也不甘示弱，我们也成立了一个“红星”组织，算是外国红卫兵小组织吧。他们大多都不是在中国出生的，是50年代、60年代随父母过来的外国孩子。我们柯家这弟兄几个基本上是横跨中外，在中国长大。另外，因为我父母后来觉得还不能把西方文化丢掉，所以跟这些外国孩子也能打成一片。红星其实充其量也就十几个人，组织也不严密。而且我们缺乏一个像北大附中牛、宫、彭那样善于组织和煽动的领袖。我觉得，大家都有点不冷不热的。不过，对年轻人来说，反正挺好玩的。不过这个组织的一些人，有的到现在还挺左的，有的后来挺有出息的，都是名人了。也因为有了这么个组织，外专局在南配楼给我们中学生的“红星”也安排了一间房。

这些外国孩子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搞这些。比如像卡玛，她就不屑，有点瞧不起我们，觉得你们这些外国孩子自己能搞出什么名堂。她是101中的，就和学校同学一起活动，不参加我们的活动。当然其中还有卡玛和我之间的一点小意见。我1964—1965年在英国住校上了一年学，回来后卡玛就问我：英国怎么样啊？我说：特开心，特好。后来就有人传，说卡玛对你有意见，嫌你是被糖衣炮弹给腐蚀了。资本主义应该是水深火热的，怎么还挺开心啊？不过，我们关系还是一直非常好的，我也没问过卡玛，是不是当时对我有这个意见。

这个红星都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有时候要学习，有时候要讨论，然后还要做些宣传。我们也有些组织形式，还设了一些职位，我还曾经一度被选为宣传委员。我当宣传委员，主要是因为我爱写字的，在崇文小学写板报什么的。我那个烂字，只不过在外国孩子里算好点的，人家也觉得说的过去。反正我爱写，所以搞宣传，写一些东西。有一个巴西专家，是“白求恩延安”的，特别支持我们年轻人。他还给我们弄了一套油印机，就是那种刻蜡版的那个东西。然后我就在友谊宾馆那个红星队部里刻蜡版，还油印出一些宣传刊物。不过，我一个都没留下了，真可惜，想知道那时候我写过些什么，都搞不清楚，一点不记得了。那时候解放军到工厂支左，我们搞对外宣传就去工厂。我记得有一回好像是去北京钟表厂。其实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国际主义，不过老三篇里讲了，向白求恩学习嘛。那外国人革命也是挺好玩的，我哥就去给他们讲，闹不好有上千人呢，十几岁的毛孩子就去给工人讲话。

#### ◇ “国际间谍”

开始我们都搞些正经的事，都是什么政治啊，革命啊。但是好景不长，不久，我爹就被当作“国际间谍”抓起来了。我听说这事时还在工厂劳动呢，多不光彩啊。老爹原来挺革命的啊，人家说我也是挺革命的。那时也还有一些海外的代表团被安排到光华木材厂参观。有天，我正在车间里干活呢，来了一队人，还有十几个人陪着，好像是香港和港英当局斗争的英雄们。他们走到我的钳工案子前面，发现这儿怎么还有一个外国人。一问还是个英国人，这是怎么回事？厂里的人就介绍说，他们家革命，是共产党，这孩子来这儿和工农相结合。这些参观的人就拍手，喊些国际主义的口号。当时我心里特美，可能工厂里也觉得挺光彩，还有个国际战士跟他们在一起。可是，我父亲却被抓了。过了十来天，这个消息就传到工厂了。工厂就通知我说：柯马凯，你在这儿学习锻炼得差不多了，我们给你开个欢送会，你就可以走了。当时，工厂送了我一个主席像，挺精致的，现在还在家里珍藏着呢。

那时，我弟弟太小，我哥那时候就爱看书，他们都不怎么闹。我就跟我妈就开始给我爹打抱不平，就跟他们去闹。我记得我跟我妈有一次跑到卫戍区去了，那时候卫戍区在护国寺附近，辅仁大学那儿。我们都带着铺盖卷去的，要人去了，我们不走了。可是后来我们还是没在那儿住。

不过，当时我跟我妈闹得挺厉害的。尤其是我爸工资停发以后，我妈就觉得这不合法律程序啊。你们凭什么停发他的工资呀，谁证实他是特务了？连指控什么都没有，又没审又没判的，你们怎么能停发工资啊！结果，当时北外的财务也觉得，是啊，既然这样那就发吧。后来我父亲的工资就接着发了。打开这个缺口，我们就更斗志昂扬了。这时，北外已经是造反团的天下。我妈紧接着又跟北外造反团的头儿说：你们把柯鲁克当间谍抓起来，根本没有丝毫根据，他绝对是好同志。就说我吧，我不仅仅是他妻子，我跟他已经是几十年的亲密同志了。要说他是间谍，那我不也成间谍了？！得，你不是这么说吗？1968年12月，等于说隔一年多一点，他们把我妈也给抓起来了。

我们都没人管，就堕落了。这时我们的队部就成为了我们俱乐部了，买些酒，然后在那过夜。有一回我喝醉了，第二天醒来，发现我躺在卫生间的瓷砖地上了，觉得脑袋还挺疼。后来有人说是我们喝多了，一闹把我推倒在地上了。

我父母从1968年就都不在了。而且我妈被抓起来之后，等于说我们家就彻底没有好人了。我们哥几个就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后来就把我们安排到海淀农机厂去了。上面还跟厂里的军宣队打招呼说：这几个是外国特务的孩子，要管好看了。我在那儿干了两年，当钳工。后来给我们另外安排工作，换到北京首汽汽修一厂，不再说我们是“特务子女”了。

我妈被抓起来以后，我还是继续上访。当时我哪儿都找，什么公安部、外交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卫戍区，我都去了，而且跑了好多次。按现在的说法，我都成“上访专业户”了。

我去得最多的是北京市外办，他们经常给我吃闭门羹。还有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公安局外事科，我也常去。大喊大叫的，闹得很厉害，但不管用。

#### ◇ 周恩来赔礼道歉

我觉得我对中国已经失望了，到后来都不想在工厂继续干了。我已经20出头了，想上大学。那时候我就想走，离开中国。

当时中国的出入境制度，需要办一种出国签证，就是外国人入境要办签证，出境你还得办签证。他们不让我走，不给我办出国签证。

那时候外国人在中国，还有一个居留许可制度。大概是1972年，外管处通知我们，居留许可证到期了，去公安局办延期手续。我说：延什么期啊，我才不延呢！你们最好把我驱逐出境。结果他们主动替我把居留证给办好了。

我妈是1972年出来的，我爸是1973年1月27日出来的。我爸被关了五年零三个月。当时秦城大概关了10多个老外吧，包括夏底诺（新华社外籍专家）、戴乃迭（中国文学出版社的英籍老专家）、爱泼斯坦（加入了中国籍的犹太人、对外英文刊物《中国建设》编辑）、我爸等，都是同一批释放的。李敦白是唯一的例外，那次没放他，好像是晚一年多才出来的。1973年3月8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把这些释放出来的外国人，包括家属，都请去了。“四人帮”里头也去了几个人，江青也去了，可是他们都没说话。

那天是周总理宴请，他首先代表中国政府赔礼道歉。他说：冤枉你们了，你们是好人的。可是总理当时还有一句话说：不过也有坏人，像李敦白。

周总理讲完话，然后就轮桌敬酒。到我们这一桌，先对我妈说了几句话，然后敬叶文茜（北大西语系的美国教师），最后走到我们哥几个面前说：我知道，你们想出国上大学。好啊，你们回去上大学，学完了还要回来嘛，这是你们第二故乡嘛。

我是又感动，又矛盾。嘿！我们要出去的要求，他其实早就知道啊！我确实挺气的，真想恨谁。可是，另一方面我还是挺崇敬周总理的，给了那么大的面子，我都不知道该恨谁了，觉得总不能恨总理吧。

#### ◇ 英伦的左派

出国签证立刻就批了，国家还答应给我们出路费。我们觉得这是个见世面的机会，就跟他们说：你们别给我们买机票了，把机票钱给我们，我们自己想办法。后来，他们答应了。我印象中，给了我跟我哥每人一千美金。

于是，我们坐火车去了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到新加坡，从新加坡陆路到马来西亚的槟城，再坐船去印度的马德拉斯，一路坐车到了英国。这一路走了大概有五个月吧。在印度，我们呆了三个月，就跟当年红卫兵大串联一样，睡在车站的站台上，把贵重东西包起来当枕头这么一枕。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耽误，我中学就等于没上，到伦敦以后，首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中学的课程基本补下来了。1975年我考上了伦敦大学，学的是物理专业。

1973年临行的时候，我妈嘱咐我们说：你们这次回英国以后，要扎根在无产阶级中间。我到了伦敦以后，很快就找到工作，进入工厂。除了解决生计，也有我妈嘱咐的这个阶级立场的原因。我加入了工会，只要是工会组织的工人斗争什么的，我都积极参加。

当时我也参加过几个极左组织。我父母原来都是英共的，中苏决裂以后，我们就算它是修正主义党了，我就对它没有兴趣了。当时还有两个组织，一个叫英共（马列），即英国共产党马列派（CPBMC）；还有一个叫做英联，英国共产主义联盟（CFBMC）。我参加过两次他们的组织活动，但实际上我还没有被正式接受就被淘汰出局了。因为跟他们比，可能我思想太右。

后来我又加入了一个小政党，可是那个小政党更左得出奇，他们的偶像好像还包括江青，把中国说得好像人间天堂。他们曾激烈地争论，中国当今社会有没有剥削？这成了一个理论焦点。当时我就说，毛主席说中国仍然是阶级社会，就凭这个说法，中国还是有剥削的。结果他们认为我有思想问题，就把我开除了。

我在英国学完本科后，1978年回到了中国。

1973年我走的时候心里有气，曾经发过誓，这一走我就再也不回来了。可是家人在这边，而且这里也是我的故乡啊。

1978年，要改革开放了，大家都琢磨着出国，这外语就成为最要紧的事了。他们说：嗨，中国的物理人才有的是，不缺你，你就教英语吧。我想也是这个理儿，所以就开始教外语了。到今天，一直从事教育。

□ 摘自《回忆与反思》

~~~~~

【史实考订】

关于《毛泽东最后十年》的一点看法

• 唐少杰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1月再版陈长江、赵桂来著的《毛泽东最后十年》（初版为1998年）一书。作者陈长江自1951年跟随毛泽东并自1962年担任毛泽东身边的警卫队队长。该书对于了解毛泽东晚年的生平活动有一定的价值。在“再版说明”中，出版者指出，该书作者在初版的基础上对史实进行了“一些核实订正”。通读该书后，我就几个史实的界定提出看法，欢迎作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首先，作者关于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所谓“五大领袖”的一些记述与事实不符。根据我对蒯大富、韩爱晶的多次访谈，并借鉴已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和韩爱晶已写成并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的有关回忆，我认为，作者的记述有以下错误：

一是作者说，在这次召见活动中，蒯大富是上述五人中第一个来到会场的（第79页），其实蒯大富是最后一个到达的。蒯大富是7月28日凌晨带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残余的武斗队伍到北京航空学院“避难”，6点左右他外出返回北航时才从北航“红旗”负责人之一戴维堤那里得知聂元梓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电话，转告他“中央首长要接

见”，要求他尽快前往。毛泽东“七·二八”召见之所以进行了五个多小时，原因之一就是等待蒯大富的到来，蒯大富到达时这次召见活动已进行了约一半时间。

二是作者说，蒯大富进入人民大会堂时受到两个哨兵一左一右的搜身检查，“经搜查倒没有发现他带什么武器等危险物品。当然对他带的水果刀子之类小件我们并不在意”（第80页），陈长江说是他把蒯大富领进118厅会议室的。蒯大富多年前对我说，他那天进来时随身没有也不可能带有小刀等凶器，一个哨兵走上前来很客气地问他身上带没有带武器，蒯大富作了否定回答，他没有受到搜身。蒯大富进入人民大会堂118厅之前，谢富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出来接他，一见到谢富治，经过了20多个小时奔波和“鏖战”的蒯大富流下了眼泪。谢富治上前给蒯大富整了整衣裤，把蒯大富那沾有泥水的（7月27日傍晚下雨）、挽起来的裤腿放下来后，带着蒯大富进入会议室。

三是作者引用哨兵的话，说蒯大富下车后告知哨兵“毛主席叫我来开会的，我要见他……”（第79页）、“毛主席找我研究问题……”（第80页），蒯大富不可能说出此话，因为他在进入118厅之前不知道是毛泽东召见他。7月28日清晨5点他还和他的同学陈育延、张树有、段永基陪同下在北京电报大楼给毛泽东等发出紧急电报，告知清华大学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并要求毛泽东等接见。若是蒯大富知道毛泽东3点多已开始召见，他既没有必要发出这一电报，也不会发生他进入会场时一眼看到身着白衬衣的毛泽东端坐在沙发上，惊奇万分，百感交集，一头扑进毛泽东怀里嚎啕大哭那一幕，也就不可能有他当着毛泽东的面听到工人宣传队是毛泽东本人派出时脱口说出的“不可能！”。更有可能，蒯大富若是事先知道毛泽东召见，也就等于有可能间接地知道7月27日进入清华大学的三万多工人宣传队是何人所派了，也就很难发生那一天的严重流血牺牲事件了。非常值得探寻的是，为什么向清华大学派出这三万多工人宣传队这一重大事情，事先没有通知包括蒯大富在内的清华大学任何一个人。

四是作者说，这次召见结束时“差不多快到中午了”（第81页），其实是早上8点半左右。作者在该书中引用汪东兴的话强调毛泽东这次活动“是召见，不是接见！”（第79页），印证了韩爱晶在其回忆文章中谢富治对他们先来的四人所强调的也是“召见”而不是“接见”，说明了那时毛泽东这一举措的某种特色。但是，不知为什么，作者在该书中没有引用其多年前的有关回忆，即毛泽东7月28日凌晨两点左右入睡不久被周恩来打来的电话叫醒，毛泽东在电话中得知了清华大学发生的流血事件后脱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陈长江、李忠诚：《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转引自《共和国历程》编辑委员会编：《共和国历程》中卷第1133—1134，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毛泽东的这一反应可能更说明一些问题。

其次，作者提到，1969年10月1日天安门国庆观礼时，“许多红卫兵，不少是造反派头头，记得有著名的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等所谓的学生领袖，也登上城楼，挤来挤去，显得非常活跃”（第102页）。实际上，由于“文革”红卫兵和造反派运动已在1968年秋季全盘衰落，聂元梓自1968年10月后就开始受到隔离审查，蒯大富于1968年12月由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304厂（铝厂）工作，谭厚兰和韩爱晶也被变相“处理”，他们已不可能在1969年10月登上天安门了。

再则，作者在讲到毛泽东1971年9月11日由上海乘专列返回北京时，本打算在12日凌晨路过济南时约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因杨得志“到泰州检查工作”（第143页）而作罢，此言差矣，杨得志当时去的是山东省南部兖州一带，而不可能是江苏省的泰州地区。

另外，作者在讲到1973年12月20日在毛泽东主持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会议时，说到徐向前也来参加此次会议，由于1969年10月林彪“一号命令”的实施，徐向前被疏散到了外地，而此次会议是“‘九·一三’之后徐向前和毛主席第一次见面”（第183页）。这里有误，因为毛泽东与徐向前在1973年8月中共“十大”上是见过面的，作为“十大”主席团成员，他们的座位应该相距不远。

最后，作者提到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发毛泽东逝世消息的时间是下午3点（第236页），此处有错，应为那天下午4点。

总之，尽管该书在再版的该书封面、封底分别标有醒目的“最真实记录”、“记录最真实原貌”等字样，但是作者在“后记”中也表示欢迎读者提出意见，所以，我个人希望作者修正上述错误，并祝愿他们有更多更好的回忆毛泽东生平活动的著作问世。

□ 原载河北《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A版第九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